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	---	---	------

卷 内 目 录

[illegible]

楊一辰同志回憶 1929—1989 年

中共滿洲省委及黨順黨組織活動情況

(按：楊一辰同志 1929 年在中共滿洲省委作工運工作，1930 年曾任滿洲臨時總行委組織部長和奉天市委書記，1933 年任奉天特委書記；在 1929 年 7 月至 1930 年 11 月間，曾任黨順巡視員，特派員及縣委書記。現任青海省商業廳長。)

1929 年 4 月我在山東越獄到東北，6 月間寫信給山東省委與滿洲省委上關係。我到滿洲省委時，書記是劉少奇同志，據說少奇同志是在 29 年初做為中央巡視員到東北的，因當時滿洲省委遭到破壞，就留下來做省委書記。1930 年 2 月少奇同志調回中央，饒漱石暫代省委書記，3 月中央派來滿洲任省委書記的是李自芬，4 月省委組織就遭到大破壞。我從黨順回來，林仲丹同志從哈爾濱回來，組織臨時省委，林仲丹任書記，我做組織部長，趙毅敏（劉昆）做宣傳部長，王鶴壽同志做團的工作。6 月我去中央開會，根據中央指示我回來就成立總行委，王鶴壽同志不同意取消共青團，鄒大鵬這時就搞青年部的工作了。

1930 年 8 月，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中央派陳潭秋同志來滿洲任省委書記，北滿特委書記是孟用潛同志。

四中全會是王明路線，全總羅章龍反四中全會成了右派，唐宏經在東北也成了右派頭子，不承認錯誤被開除黨籍。

1931 年 9 月 18 日，事變以後，中央派張應龍（又名張夢寬）來滿洲任省委書記，組織部長康如恩，宣傳部長趙毅敏，宣傳幹事楊先澤。有朝鮮叛徒告密，組織破壞楊先澤被捕叛變，供出張應龍，張應龍也叛變了。這時，省委就撤去哈爾濱。中央又讓羅登賢做東北巡視員，任滿洲省委書記。

1932 年 4 月中央調羅登賢去上海，派李實（又名李抱一）接

任滿洲省委書記。哈爾濱最初分東西兩區，東區書記是張貫一（即楊增字），西區書記是姚（禿子，趙志剛同志知其名）。以後合併為市委，張貫一任市委書記。張貫一同志去南滿游击隊，我任市委書記。

1929年黨的組織有很大發展。北寧路工人發展的較早，在沈陽建立皇姑屯大廠，從關內介紹轉來一批工人黨員。從前只注意工人，大革命失敗以後也注意了農民。在台安、遼中、沈陽北卅多里略的農村，都發展了黨的組織。第三國際指示，讓中國共產黨發展朝鮮共產黨下層黨員。朝鮮當時有三派，即ML派——馬列派、火火派，上海派，鬧的很兇。這時，省委直屬組織有奉天特委、東滿特委、北滿特委，大連市委；在海順、遼陽是特支，還有營口市委、台安縣委以及支部。羣眾團體有：農村的農民協會——抗租抗稅，反帝大同盟，赤色救濟會，爭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聯盟，共青團。黨的組織的發展29年前我不了解，29年發展很快，原因是：(1)吸收了朝鮮黨員，壯大了組織；(2)吉會鐵路事件，提高了羣眾覺悟，組織了反帝運動；(3)在少奇同志領導下，中東路复工運動搞的好，此外還有皮鞋工人罷工，北寧路工人年關花紅鬥爭，歐陽強表現很好，以後李紹伯、李運昌也都去過，與歐陽強也認識。這一時期，受立三路線影響，逢節日就活動，在哈爾濱砸日本領事館，在東滿搞試驗暴動，都受很大損失。到30年省委在李自芬去不久就遭大破壞。

在1929年軍事工作也有很大發展。中東路事件，張學良軍隊被蘇聯俘去韓光弟、梁中甲兩個漢，蘇聯處理^的很好，提出三個條件：(1)恢復戰前狀況；(2)釋放俘虜；(3)九月內談判。俘去的那兩個^的經過教育後釋放回來，這些人都找共產黨，軍事工作很快發展起來。以後，在30年立三路線時，在韓克圖搞軍事暴動未成，遭破壞很大，軍委書記小林同志牺牲。九一八事變後，北京還派一批學生來東北

搞义敢軍工作，有李兆麟、於天放、馮云阶、夏尚志等，他們搞很多义敢軍，但当时也有左傾盲动情緒，搞起的軍隊叫紅軍，羣众不了解认为是土匪报的山头。1933年接到中央指示後，紅軍改为人民革命軍，最後才改为抗日联軍。

“九一八”事变，当时我正住監獄，那个时候的形勢，据我知道在“九一八”前日本对滿蒙已采取积极侵略政策。日本首先田中义一給天皇奏折，主張很快占領中国东北和蒙古，积极准备，布置活动。我們了解这个情况，張学良也知道些。張学良不想貼日本，杀了楊宇霆、常蔭槐、修筑与南滿铁路平行的铁路，在葫芦島开軍港。但，張学良很不爭气，很墮落，吸毒，玩女人。蔣介石不叫張学良得罪日本，張学良想靠英美。我們在1930年，由於立三路綫的影响，使党和軍事工作都遭到破坏，这时正組織、整頓、积蓄力量。就九一八事变。日本子扒了柳条沟，炮轰北大营，張学良請示蔣介石，蔣介石不叫打，兵就撤了。日本子就找汗奸組織維持会，很快，赵欣伯当了市长，齐恩铭当了警察厅长，酝酿自治。这时羣众抗日情緒很高，据说撫順拉出一万多人；哈尔滨的一个小村子一鼎新屯，就拉出去好几千人。沈阳兵工厂工人最积极，有个工人党员梁永盛同志知道武器仓库，想砸仓库拉出去，当时的奉天特委書記陈德森不敢干，後被敌人发现，梁永盛牺牲了。这时，老百姓到处打义旗組織义勇軍，以岩邓铁梅，山东唐聚五。那时，国民党放棄领导，我們正处在王明路綫时期力量很薄弱，中央也沒有明确指示。後來，羣众搞的武装，想发财，搶些东西就完了；地主搞的武装，想保产，看家护院；敌人也叫汗奸搞义勇軍，搞起来就領去投降了。这样义勇軍就垮下去了。我們当时，也搞些武装，在北滿是一个清华大学学生張甲洲先搞起来的，做了区队的长，組

组织了游击队，在巴彦、庆城、额尔古纳一带活动，后成立卅一军，共三个团，其中一个土匪队，在一次战役中打垮，土匪队就拉出去了。在南满烟筒山有旧吉林军一个旅，我们派去一个人说服，变过来一个连，士兵都想发财，抢些东西就都回家了，扔下百十多条枪，我们派一个军事干部杨林去组织队伍，杨林是指挥正规作战的，不会打游击，省委调回雷军委书记，又派嘎哈子（名忘了）去了，发展200多人，这里有个“胡子队”“全好”的人，想把我们枪搞去大干，省委看不好，派杨靖宇去把“全好”甩了。在哈尔滨附近也搞了一个连伪军，日本人来了硬碰，负责人牺牲了，垮了。双城堡拉出一个连，抢点东西就散了。苏炳文部队派去不少学生，后去苏联就没回来。韩光同志在羊河搞一队伪军，以后和周保中队合了。这时候，我们没有明确方向领导，农村工作基础薄弱，我们不是像芦沟桥事变那样，“脱下长衫打游击。”农村的口号还是：“建立苏维埃政权”群众接受不了。汉族和朝鲜族之间，还不够完全信任，日本子造谣“不怕五洋闹中华，就怕白狗进了家。”恶毒的挑拨种族关系。对好人，坏人分不开。就这样敌人很快站住脚，逐步向北推进，吉林省的张作相不在，参谋长逃往敌，奉天省长赵式毅扣起来之后也没敌了。接着日本子占长春，攻陶翰昭，打哈尔滨；还利用奸奸活动召开巨头会议，使上层分子叛变，敌人又修公路，併村屯，把抗日武装个个击破。

九一八以后，上海一二八暨秋白同志写一篇文章，说日本占领东北后，我们策略应转变；但，王明同志不采纳，我们这时，是自觉不自觉的转变。把原来的反帝大同盟改为反日会。在日本没占领哈尔滨前报纸公开发表抗日言论。我们还提出：“改苏维埃政权为抗日民众政权”的意见，请示中央没同意，受了批评。

1933年春天，中央来信指示（经苏联转来）说：“日本侵入东北

27

北，不仅侵犯了无产阶级利益，而且也违背了有产阶级利益，部分有产阶级产生了抗日要求，应搞人民统一战线，组织人民革命^军和人民政府。“应赶快转变，不然人民产生失败情绪，再搞就晚了。”这时，有些转变，如把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动员党员支援游击区搞农村工作，组织游击等。33年中央遭一次破坏，搬去苏区，我们和中央联不上了，就摸索着干。1933年到1936年有很大发展，特别是抗日联军发展很快。

1936年敌人贴大标语：“有一个共产党也要消灭净！”从前敌人对付共产党，是对~~拿枪的~~毙，没拿枪的判刑！这时，就是：杀！

我们在监狱中也有活动，在我入狱前监狱是杨靖宇负责，看守所（没判决的）是赵毅敏负责。我在30年入狱后，杨靖宇走了，我就负责了。在监狱中，强调监狱是革命战士的休养所，由于我们团结看守，啥事都可托他买到。组织大家学习。在狱中除了小偷、骗子、人贩子外，我们和各种人都有联系，在难友中发展互济会，互相照顾，影响很好。在监狱中的工作，除了上边说的：还有“（1）团结看守，

看守说政治犯是闹国事的好人。我们帮^他们写请假条，写告状的呈子，刘伯刚还教他们日文。刘伯刚的同学在医务所当所长，后来把刘伯刚弄去帮他抓药，看病。（2）对叛徒进行斗争。团组织破坏了，张伯生叛变了！张干民也供出很多同志，我们就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让看守和难友们骂他们，我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叫他们翻供以减轻同志们的“罪名”后，说服了张伯生，自己判12年徒刑，把别人都放了。（3）对敌人斗争，坚贞不屈，有证据也不承认犯罪。我们也有过激的活动，搞绝食斗争，反对教诲师去说教，打看守，使我们的

78
路越走越窄。

在滿洲省委呆过的：

任国楨，安东人，北大俄文系毕业，是个老同志，什么时候来沈阳不知道，在哈尔滨也活动过，听说后来牺牲了。

张洛书是我下班同学，同在山东入党，曾派去苏联学习，因身体不好回沈，派去太連任市委书记。

张豁然，是团省委秘书长，叛变了。

朱全胜，山东人，法国华工，在法国入党，曾在上海、大連工作过，后因故人追索，到处轉，长期沒有組織关系。42年冬在陇海路南几十里的地方见过面。

柳清水，原是人力车夫，现在在修陵车站他儿子那里住，他儿子在修陵铁道小学教书。

罗茂先，曾任哈尔滨时期滿洲省秘书长，55年在青島紡織工业局任办公室主任。

李买，（又名李抱一）曾任滿洲省委书记，現任中央教育部中等师范教育司司长。

我在扶順工作过。

扶順的背景是这样的：封建势力比較深（辽宁省商业厅佟厅长了解些）据说在明末辽阳住个总兵李国良，那时称扶順地区为辽东，李国良的勤务員是努尔哈赤，李国良想害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就跑去兴京（即新宾），扶順的范家、邵家、佟家都跟去了，就建立滿洲帝国。滿清进关扶順做大官的就很多。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想独占辽东半島，德国和帝俄出来干涉，于是帝俄侵入辽东，在扶順开发“老揭蓋”煤矿。日俄战争以后，

以东

南滿划为日本势力范围。这时扶順煤矿，除渾河由中国自己开采外，渾河以西以南全归日本开采。日本开发的很快，造立了大小坑，东乡（胜利）、古城子、搭連咀等矿井，安装自动化，日产二万吨以上。但日本子对工人的剥削压迫是很利害的，比郭沫若翻译的“石炭王”小說上形容的还厉害。每个工人平均日产二吨煤，有时連續二十五个班不上井，并受重重压迫。工人们饱受警察、劳务系（拉帮的）的打罵，故人还利用流氓装工人当腿子迫害工人，汗奸把头勒索工人。工人工资很低，仅能維持生活，但是，把头們还說煤里有石头，克扣^{20%}；工人吃飯不交錢給飯票，七折八扣。工房很簡陋，二层板子上下住人。把头們招工招不来，就到农村去騙劳工。騙来就不准回去。当时有郑福臣，郑家大柜；还有付家大柜，张家大柜，都是大把头。工人对那时的悲惨情景，編了一套歌：“一到千金寨，就把鋪蓋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因为工人生活穷苦，生产条件恶劣，天天都死人、伤人。医院在每天都成筐的往外拿“小泥蹄”都是从受伤工人身上锯下来的胳膊和大腿。死了工人就装个木箱，次着喇叭抬出去。当时工人想逃很难，日本子对指紋很有研究，誰要跑別处去，对指紋查出来就关起来。此外，还利用“老君庙”“老君堂”迷信，来迷惑工人。工人对这种极为黑暗的残酷統治，是不断进行反抗的。經常有打死警察，打死腿子；打把头集体逃跑的事件发生。这都是群众自发的斗争。由于沒有党的领导，所以很多斗争，不是失败了就是沒有結果。

20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楊清宇（原名馬尚德，号驥展，化名張貫一。）曾在开封被捕，出獄后在河南呆不下去，就到中央，29年春天派来东北扶順做党的工作，别人称他“大馬”。以后山东派来一个“小馬”叫馬守愚，又名王振祥，做团的工作。那时，大連組織破坏，跑去跑去扶順几个党员，有范青仁（又名范青），潘敏久。他們就在扶順开展工作。

1929年7月我和省委組織接上关系，做省委组织部干事，以巡視員身分去扶順，想当工人做长期掩护。当时，大馬，潘敏久沒有社会职业，范青仁开永兴鑄铁厂，小馬考上工人。小馬介紹我去考工，沒考上又回省委了。那时的扶順組織状况記不清了。

1929年12月扶順党团组织都建立了特支，直屬滿洲省委領導，党特支書記是大馬，团特支書記是小馬。这时，省委又从沈阳紡紗厂派去小苏（可能是苏振久）夫妇，到扶順工作。这时，在新站、古城子、东乡一带有了党团组织。到1929年底，紀念什么，撤傳单被敌人发现，跟上小馬，小馬被捕供出大馬等人，于是大馬、范青仁等被捕，姓馮的党员跑了。大馬被捕后受刑很重，但始終沒承認什么。范青仁因为成了小資本家，被捕就密秘叛变了。1930年把大馬、小馬送中国法院，各判刑一年。小馬被开除党籍，現在，在湖南工作，劳动部长刘子久同志知道詳細地址。

1930年3——4月間，省委派我做巡視員，去扶順检查工作。当时，扶順組織仍然是特支，書記是誰？委員有那些人？我記不得了。我到扶順近一个月，派袁果（当时做团的工作。）去省委汇报，他到沈阳找不到省委人，在街上碰見蔡伯强（又名邵麻子，中央保紀人員。）才知道在4月下旬省委遭到大破坏。叫我和哈尔滨林仲丹回沈阳，

81

我們就組織了臨時省委，林仲丹任書記，我做組織部長，趙毅敏做宣傳部長。1930年4月省委被破壞時，張干民（又名張存禮，化名趙文棟）也被捕，但很快被釋放，省委就派他去扶順工作。當時還派有王永慶、王金五等同志，計劃打入礦山當工人，和工人接觸，發動群眾。這時，張干民任特支書記，工作開展的很快，發展10^名黨團員，70——80名工會會員。做團的工作的是李愛民，他是吉林的一個學生，在反吉會筑路後去扶順的，工會主席是郝金貴。工會組織在八大^處都有，記得：大山坑是郝金貴負責，古城子是李鵬年負責，搭運是韓全會負責，萬達屋是劉榮之負責，金溝也有工會組織。9月間，中央三中全會後，派陳潭秋同志來東北任滿洲省委書記，讓我組織奉天市委任市委書記，不久中央社全總住滿洲代表劉錫五同志接任我的工作，省委又派我以特派員的身分去扶順工作。不久，回省委匯報扶順工作時，省委決定成立扶順縣委，叫我任書記，張干民做委員搞工會工作，郝金貴這時去中央參加一個什麼會去了。李愛民做團的工作。

1930年11月，為紀念十月革命節，撤傳單，展開活動有點暴露。范青仁在29年被捕已^{被變}秘密成為內奸，黨當時不知道。黨的一些會議都讓他參加，我們縣委機關找房子，補保還是找的范青仁。這時，林仲丹同志來扶順檢查工作，之後我們把他送走了，當晚，警察就把後營地包圍了，把張干民、李愛民抓去；我到張干民處去接頭也被捕。後來，才知林仲丹同志走到路上叫他們抓去了。這是范青仁告的密。

我們縣委機關設在後營地大山坑邊，油廠南小土房裏。住機關的

82

是王二姐（山东維县人——現在維坊市全斌乡人民公社——王全五的二姐。）她有个姪子叫小羊，說我是王二姐的弟弟，說張干民是王二姐的小叔，說李爱民是王二姐的儿子。我們被捕时，就說的这个关系。

我們被捕后，分別关着。听說林仲丹同志表現很坚强，受刑很重，几乎成残废，可是什么也沒承認。敌人給我上刑，成天吊着，两个胳膊都不会动了，什么也沒說。張干民也受刑，表現很坏，八大矿的負責人全供出来，接着敌人又抓来10多个人，有刘荣之、馬德水、李鵬年；王全五在栗子沟所以沒被捕。后来，我看見張干民，叫他招供，他不收，怕受不住日本的刑，答应到中国警察局翻供揭出別人。因我們刑历重，到阳历年养的差不多，就送奉天中国法院。因我没口供，叫我找保释放，因当时我化名李德祿，里外不通气，没找到保判刑一年。刘荣之、李鵬年判一年半。判刑后送进監獄。林仲丹、張干民各判五年，他們不服都上訴了，沒判决就沒送进監獄。

林仲丹是在31年底或32年初，用钱买出来的。

我是1932年2月刑滿出獄。

刘荣之也在1932年出獄，出獄后不久病死。

張干民在1933年出獄，之后当警察去了。

听說，李爱民出獄后在日本統治时期得了精神病，“八一五”还活着；不知在何处。

王永庆是王二姐的老乡，山东矿工，曾任山东省委委員，以后到东北，現不知在何处。

王全五后調去省委工作，又調去延吉搞游击队，牺牲了。

小紀，山东維县人，30年5月去过扶順，后考上馮玉祥大学，不知去向。

安平，开原人，滿族，他是个老同志，什么时候入党不知道，他在1928年前以国民党身分被捕，住吉林監獄，在1928年东北換国民党旗时，把他放出来，大概在29年去的扶順，他去扶順时，馬尚德正在扶順。馬尚德他們被捕，安平沒被捕，以后不知那去了。佟如功、王仁壽都在沈阳，辽宁政协秘书长李維舟知道他們。

刘景增、王东軒这二个人我不知道。

1932年2月我出獄后就去哈尔滨。据说：1932年扶順党团组织又恢复了，塔灣有个小宋（名忘了）是技术工人，他是党员，也是团员。曾調他到奉天政团特委书记。听说以后到北滿逃往了。

1933年4—5月，找回奉天，据说扶順有党的组织，詳細不知道。那时，在清原有党团县委组织，直属奉天特委领导，清原和扶順沒有组织关系。清原团的负责人，是张观，（现在吉林省长春工作，曾在外交部工作，可去外交部或中央组织部去查。）在奉天大南門里基督教青年会向我汇报过工作。党的书记是姓朴的朝鮮人。县委机关不在清原城内，是設在草市。据说，新宾也有党的组织，具体情况不知道。

关于扶順的党组织活动情况，有些已经談了，有些問題我不知道，有些問題已記不清了，就我知道的再談一下。

1927年扶順地区党负责人，那个姓王的不知是誰，他不是王永庆。

1929年6月22日滿洲省委給扶順特支的指示中提到的人，王是王振祥，即小馬；关是安平；青可能是范青；葛这个人我不知道。

1928年8月31日臨字通告第二十七号，主要内容是指示叫利用合法形式斗争，组织工厂委员会，扶順没有什么行动。

1930年10月中央計劃中提到的正义府，是朝鮮民族主义派別，很反动，头子是李青天。M L 党就是馬列派，PY分子，就是共产主义党团分子；C Y 是共青团代号。那时，农村中，由于日本人的挑拨，并且有部分朝鮮人弄黑紅室，开大烟館，所以，中国人就反对朝鮮人。

1930年7月是立三路綫时期，滿洲省委已改为滿洲总行委，提出总暴动，扶順跟工人談过，沒搞起来，中央就召开三中全会糾正立三路綫。

1930年10月就开始轉变，不搞暴动了。主要是积蓄力量，保护和爭取工人經濟利益。

1930年5月23日給滿洲省委的报告，是我寫的，記得寫的挺长，主要寫的是工人生活状况和組織状况，詳細的想不起来了。

1930年9月7日我們在万达屋召开一次工人代表会，通过工会章程。我講的話，張干民主持的。参加会的共20多人，八大矿都有，有馬德水、李鶴年、刘荣之、韓万順；郝金貴沒参加，他沒在扶順。

1930年，这一年的年初，属于恢复組織阶段，主要是和群众拉关系，組織他們看唱本（一般的）找乡亲，交朋友。领导工人作經濟斗争，蒿头生了，包圍大柜，发的飯票不值錢，要求发錢，大柜沒答应。5月立三路綫露头，革命来潮說是高潮，接着就組織暴动，因为群众对敌人仇恨，在古戒子南打死过特务，进行自发斗争，我們組織群众暴动的要求，群众接受干，他們要枪，沒組織起来。中央来信指示叫轉变。这一年扶順没什么大斗争。到11月，因为受立三路綫残余影响，逢节日撤傳单，范青告密被破坏。

1931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子对中国民族工商业有很大打击。

04
(1)沒收了官仵企业，在辽宁沒收了东北官銀号，在吉林沒收了永衡官銀号，在黑龙江沒收了广信公司，这些官仵企业很大，包括：油坊、火磨、当铺、燒鍋，开荒。(2)对較小的企业，組織联合統一管理；插股組織子公司。

整理本材料人

朱永閣

李煥亭

60年8月23日

此材料經本人审阅。

楊一農同志對沈陽地區黨的組織沿革的幾點意見和有關黨組織情況的補充回忆。

我是1929年5月到沈陽的，6月為滿洲省委接上了關係。1929年到1930年6月以前，奉天沒有市委的組織。1930年滿6月滿洲省委改為總行委時，因沒有奉天市委組織，也就沒有成立奉天市總行委。到1930年8月間（天氣正是由熱變涼的時候，我還沒有換棉衣），在省委領導下成立了奉天市委，我任奉天市委書記。

1930年11月奉天市內不只有五、六個支部，在文會中學，南滿區大都有黨的支部。

奉天特委是在1931年底成立的，這時我正任監獄裡。1932年秋出獄時奉天特委書記是陳德森（老姜、姜方，大事今時云過）。

苏联，从苏联回来以后到沈阳)，陈德森很
有些右倾，是表现在一、对赵毅敏同志第一
案在“九一八”事变后是可以花些钱出狱的，
但陈德森就不同意花钱，认为敌人是不会
释放我们的；二、对梁永成等在兵工厂要
搞一部分枪拉出去，表现猶豫，致使事情
被暴露，建议人逮捕。因此，中央决定把
陈德森调回~~中央~~上海。后来因他在上海乱
喊人，为了^{已牺牲}避免敌人破坏，而将他搞掉了。
这时由团特委书记吴夫量（^{已牺牲}扶余县张寒义右
派饶芝^{可能}知道情况）代理特委书记，吴捕
被捕后可能由小宋（是工人，抚顺塔子沟大板
工人，家在哈市吴福祥）代理书记，1932年
末小宋调回哈市吴时，由李天团特委书记
孙蔚（王义注，已叛变，现在台湾）代理书记，
1933年4月我去沈阳任奉天特委书记时，
宋已经交待了工作，但尚未离开沈阳，我